

罗根泽文存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

马强才 选编

罗根泽

惟此獨立之精神

自由之思想

歷千萬祀

與天壤而同久

共三光而永光



江苏人民出版社

罗根泽文存

LUOGENZE WENCUN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 主编

马强才 选编



 江苏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罗根泽文存/马强才选编. —南京:江苏人民出版社, 2012. 7

(清华国学书系)

ISBN 978-7-214-08525-2

I. ①罗… II. ①马… III. ①社会科学—文集 IV. ①C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152137 号

书 名 罗根泽文存

选 编 马强才

责任编辑 孙 立

装帧设计 姜 嵩
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人民出版社

集团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集团网址 <http://www.ppm.cn>
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, 邮编: 210009
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book-wind.com>
<http://jsrmcbs.tmall.com>
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
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
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 960 毫米×1304 毫米 1/32

印 张 16.875 插页 2

字 数 445 千字

版 次 2012 年 10 月第 1 版 2012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214-08525-2

定 价 55.00 元

(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)

总 序

晚近以来，怀旧的心理在悄悄积聚，而有关民国史的各种著作，也渐次成为热门的读物。——此间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当然是在蓦然回望时发现：那尽管是个国步艰难的年代，却由于新旧、中西的激荡，也由于爱国、救世的热望，更由于文化传承的尚未中断，所以在文化上并不是空白，其创造的成果反而相当丰富，既涌现了制订规则的大师，也为后来的发展开辟了路径。

此外还应当看到，这种油然而生的怀旧情愫，又并非只意味着“向后看”。正如斯维特兰娜·博伊姆在《怀旧的未来》中所说：“怀旧不永远是关于过去的；怀旧可能是回顾性的，但是也可能是前瞻性的”。——由此也就启发了我们：在中华文明正走向伟大复兴、正祈望再造辉煌的当下，这种对过往史料的重新整理，和对过往历程的从头叙述，都典型地展现了坚定向前的民族意志。

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，本院早期既昙花一现、又光华四射的历程，就越发引起了世人的瞩目。简直令人惊异的是，一个仅存在过四年的学府，竟能拥有像梁启超、王国维、陈寅恪、赵元任、李济、吴宓这样的导师，拥有像梁漱溟、林志钧、马衡、钢和泰及赵万里、浦江清、蒋善国这样的教师，乃至拥有像王力、姜亮夫、陆侃如、姚名达、谢国桢、吴其昌、高亨、刘

盼遂、徐中舒这样的学生……而且，无论是遭逢外乱还是内耗，这个如流星般闪过的学府，以及它的一位导师为另一位导师所写的、如今已是斑驳残损的碑文内容——“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”，都在激励后学们去保持操守、护持文化和求索真理，就算不必把这一切全都看成神话，但它们至少也是不可多得的佳话吧？

可惜在相形之下，虽说是久负如此盛名，但外间对本院历史的了解，总体说来还是远远不够的，尤其对其各位导师、其他教师和众多弟子的总体成就，更是缺少全面深入的把握。缘此，本院自恢复的那一天起，便大规模地启动了“院史工程”，冀能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，最终以每人一卷的形式，和盘托出院友们的著作精选，以作为永久性的追思缅怀，同时也对本院早期的学术成就，进行一次总体性的壮观检阅。

就此的具体设想是，这样的一项“院史工程”，将会对如下四组接续的梯队，进行总览性的整理研究：其一，本院久负盛名的导师，他们无论道德还是文章，都将长久地垂范于学界；其二，曾以各种形式协助过上述导师、后来也卓然成家的早期教师，此一群体以往较少为外间所知；其三，数量更为庞大、很多都成为学界中坚的国学院弟子，他们更属于本院的骄傲；其四，等上述工作完成以后，如果我们行有余力，还将涉及某些曾经追随在梁、王、陈周围的广义上的学生，以及后来在清华完成教育、并为国学研究做出突出贡献的其他学者。

这就是本套“清华国学书系”的由来！尽管旷日持久、工程浩大、卷帙浩繁，但本院的老师 and 博士后们，却不敢有丝毫的懈怠，而如今分批编出的这些“文存”，以及印在其前的各篇专门导论，也都凝聚了他们的辛劳和心血。此外，本套丛书的编辑，也得到了多方的鼎力支持；而各位院友的亲朋、故旧和弟子，也都无私地提供了珍贵的素材，这让我们长久地铭感在心。

为了最终完成这项任务，我们还在不停地努力着。因为我们深知，只有把每位院友的学术成就，全都搜集整理出来献给公众，本院的早期风貌才会更加逼真地再现，而其间的很多已被遗忘的经验，也才有可能

有助于我们乃至后人,去一步一步地重塑昔日之辉煌。在这个意义上,这套书不仅会有很高的学术史价值,也会是一块永久性的群英纪念碑。——形象一点地说,我们现在每完成了一本书,都是在为这块丰碑增添石材,而等全部的石块都叠立在一起,它们就会以一格格的浮雕形式,在美丽的清华园里,竖立起一堵厚重的“国学墙”,供同学们来此兴高采烈地指认:你看这是哪一位大师,那又是哪一位前贤……

我们还憧憬着:待到全部文稿杀青的时候,在这堵作为学术圣地的“国学墙”之前,历史的时间就会浓缩为文化的空间,而眼下正熙熙攘攘的学人们,心灵上也就多了一个安顿休憩之处。——当然也正因为那样,如此一个令人入定与出神的所在,也就必会是恢复不久的清华国学院的重新出发之处,是我们通过紧张而激越的思考,去再造“中国文化之现代形态”的地方。

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

2012年3月16日

凡 例

一、本文存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史工程“清华国学书系”之一，重点展示国学院学子罗根泽先生的生平、学术以及与清华国学院的渊源。

二、本文存所录罗根泽论著，主要涉及诸子学、文学史和文学批评史三个方面，大致涵括其主要研究领域和代表性成果，然限于篇幅，诸如《孟子传论》等，只能割爱而选取相关单篇文章弥补。

三、本文存所录罗氏文学批评史研究论著，因为有专著刊行，且较易获得，故本书从简，仅选取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“绪言”及曾经发表的部分文章，以展示他研究中国文学批评史的动机和学科思考。

四、本文存为全面展现罗氏学术思想、研究方法，选编其学术著作自序以及自述之文《我的读书生涯》等4篇，以见其研究特色和自我定位。

五、本文存所录文字底本：诸子学以《古史辩》（四、六）和《诸子考索》为主；古代文学以《乐府文学史》和《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》为主；文学批评史以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上海书店本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为主。

六、文存末附年谱简编（包括学术论文系年）、未编年作品目录及部分有关罗根泽先生的研究论著。

七、本文存尽量忠于原文，对晚清民国时期的特殊用字，如今之“哪

里”当时作“那里”等，皆存原貌；其中明显文字错讹者，径直更正而不出校记。

八、本文存尽量保持原文格式，但为兼顾现代阅读习惯，对部分行文格式略作技术调整。如，将尾注改为脚注，并将一些繁体标点格式改为简体标点格式。

前言：罗根泽的生平与学术研究

一

罗根泽(1900—1960),字漱冰^①,号雨亭,生于河北深县(今河北省深州市)杜家庄村。由于家庭经济拮据,十余岁后,即民国初年,方才进入国小学习。其后,学习生涯时断时续,至有休学跳级之事。考取深县中学后,因无力缴纳学杂费而辍学,转报师范学校,进入河北省立第一师范学习。旋即因国文教员不懂文学,与己学习兴趣不合,遂申请退学。罗先生中、小学共历八载,辗转坎坷,始终未取得正式学历。

短期彷徨后,罗根泽先生始随居家侍母的本县学者武锡珏^②研习经史和古典诗文。武氏是桐城派学者吴汝纶之高足,蔼然儒者,修养深厚,“负一方文名”,国学上颇有造诣。武氏在家开馆收徒,教学环境并不优

① 见《清华周刊》,上面罗根泽的录取名单上有此字。

② 刘声木:《桐城文学渊源撰述考》云:“武锡珏,字合之,深州人,河北大学教授,师事张裕钊、吴汝纶、贺涛,受古文法,为入室弟子,淳朴好学,文特醇雅,于文字致力尤深。”(合肥:黄山书社,1989年,第300页)

裕，前后止三间书屋，名曰“北圃学舍”，有学生五六人，不设寒暑假，然师生同处，恬然忘忧。北圃学舍的课程讲授，主要以诗文为主，老师言传身教，学生熏染安身立命之理。此时，罗先生开始练习写作一些有关先秦诸子的文章。两年后，即1920年，武氏赴北平任总统府翻译处和都门编书局担任编辑，罗先生跟随老师至北平，得以向武氏同学吴闿生、梁式堂诸先生问学，谈诗论文，学问与日俱增。然，华北大旱，加之皖系军阀失势，罗先生及同门在秋后迫于经济压力而四散谋生，遂归赴老家，就任县高级小学国语教师，因为没有学历而受到同仁及学生家长的歧视。

1925年，武锡珏赴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任教，罗先生遂考入该系学习，同时在中学兼任任课以补给家用。彼时，时局混乱，河北大学时办时停，罗先生的大学生涯同样是时辍时续。1927年，罗先生从保定河北大学中文系毕业。

纵观青少年时代的求学过程，武锡珏对罗先生影响甚大。武氏是晚清桐城派代表人物吴汝纶的弟子，吴汝纶乃桐城著名学者，曾入曾国藩幕府，后又到日本考察学政。归国后不赴京师就任，还乡谋办桐城学堂，传播西学知识，推重经学。光绪年间，吴氏做过一任深州知州，之后长期在河北一带任职，维新失败后，避难于深州。正是有此因缘，吴汝纶提倡科学，又重视文学的思想作风，潜移默化间带领深州一带成为桐城派的“殖文地”，整个学风都浸染着桐城古文的风尚。武氏曾求学吴门，自是信奉桐城文学，亦能于传统乾嘉考据之学中融入西学眼光，并不完全局限于古文。这也启发了罗先生既重视诸子考辨，也重视文学研究，在步武传统考据学问的同时，注重对西学方法的吸收。

如果说“北圃学舍”的学习生涯，是罗先生“学文的始基”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读书生活，则是他“治学的始基”。递嬗之间，似乎也暗示了桐城文风的衰落和新学的逐步强盛。罗先生从十五岁开始阅读梁启超著作，此后更以之为榜样，期望能随侍学习。1922年，时任国小教员的罗先生参加天津南开大学暑期学校，学习了梁启超先生讲授“国文教学法”和

胡适先生讲“国语文法”、“国语文学史”的课程，积累了“旧文学”的一些想法。^①课程结束后，他阅读了梁启超《墨子学案》，遂对诸子之学产生了浓厚兴趣，“掀动了作《诸子学案》的野心”，遂萌生跟从梁先生学习的想法，并在工作学习之余，完成了《荀子学案》、《孟子学案》等著作，再托朋友送呈梁先生指点。因此，要研究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生涯，就必须考虑到梁先生的影响。他也曾明确声明自己对诸子之学的研究受到梁先生的影响。^②如《荀卿游离考》前言就引用了梁任公的观点。^③又如他在《老子及老子书的问题》中说：“老子和《老子》书之真伪及年代问题，几年以前，因为梁任公先生在《评胡适之中国哲学史大纲》一文中的提出，引出了不少的讨论的文字。二三年来，似稍沉寂了。去年夏又因为冯芝生先生的《中国哲学史》大著而旧案重提……都是讨论这个问题的。”^④此外，我们若比较一下梁先生《〈汉志·诸子略〉各书存佚真伪表》与罗先生的研究计划和研究著作，也可看到其间的师承关系。正是有此因缘，罗先生与国学院曾亲炙王国维先生教导的师兄们，治学路径有所不同，较少涉及先秦古文字，而同样是研究先秦诸子之高亨、徐中舒等先生，其著作中就有援用文字训诂之学为论据的现象。^⑤

为了能够顺利考入清华国学院，罗先生曾于1927年春到清华园“晋谒”梁先生。同年7月，罗先生投考并被录取为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第三届学子。9月7日报到入学后，罗先生选择的是“诸子科”，指导老师为梁启超。在国学研究院，得到自己仰慕已久的导师指引，他自是十分兴奋，以极大热情开始了自己的学术研究生涯。与罗根泽先生一起进入

① 罗根泽：《我的读书生活》，见本书第45页。

② 罗根泽：《古史辨自序》，《古史辨》第四册，第10页。

③ 罗根泽编著，《古史辨》第四册，第124页。

④ 同上，第449页。

⑤ 因为导师的人事变动，国学院学子受到的学术指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：1925年至1927年6月，王国维、梁启超、赵元任等人执教，因而不少人的研究，选择跟王、梁二人，有几位跟赵元任治语言学；1927年6月至1928年5月，部分入学者尚能得梁启超指导，故而带有明显的梁氏学术风范；1928年6月至1929年6月，只有陈寅恪先生指导，故而学人的学术多受陈氏影响，以史学研究为志向。

国学院学习的还有王省等 13 人,其中经招生考试正式录取者 11 人,包括王省、吴宝凌、叶去非、蒋天枢、葛天民、储皖峰、张昌圻、门启明、蓝文征、马庆霄等。分别于 1925、1926 年录取的裴学海、马鸿勋,此次亦准予入学。此外,国学院还有上两届留下来继续进行研究的同学 11 人,包括刘盼遂、姚名达、吴其昌、宋玉嘉、颜虚心、刘节、戴家祥、司秋沅、朱芳圃、谢念灰、侯堦等。他们中大部分人,日后与罗先生有着长期的交往,如刘盼遂就曾推荐罗先生到河南大学工作,其他诸如侯堦、蓝文征、蒋天枢等人,在抗战时期的重庆,常与罗先生见面往来。

罗根泽先生在国学院所接受的教育情况,从 1927 年 9 月至 1928 年 6 月国学院教师及其开课情况中可管窥一二:

教授:梁启超讲授历史研究法、儒家哲学;赵元任讲授方言学;陈寅恪讲授梵文文法。

讲师:李济讲授考古学;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。

助教有王庸、梁廷灿、浦江清、赵万里等。此外,国学院还曾增聘朱希祖为兼职讲师、梁思永为名誉助教、余永梁为助教。

一年学业完成后,罗先生与门启明、侯堦、张景圻、葛天民、颜虚心、蓝文征、蒋天枢、储皖峰、马庆霄等同学十人,选择了继续留研究院研修一年。但是,梁启超先生自 1928 年 6 月开始,移居至天津租界休养,罗先生遂改由陈寅恪先生指导。^① 因此,就日后学术研究来看,罗先生不仅受梁启超先生的影响,同时对陈寅恪先生的学问和思想也多有承继。比如,在《古史辨》第四册的序言中,罗根泽先生谈到自己的研究计划时,曾经将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分为四个阶段,这一分期法,实渊源于陈寅恪先生。据《吴宓日记》1919 年 12 月 20 日所记,陈先生谈到中国古代文化思

^① 梁启超先生于 1928 年初,肾病日益严重,医生建议修养,遂于 2 月中旬向学校提出辞职,至此几乎未到清华授课。5 月初请辞去清华国学院教授职务,经校方及校长梅贻琦先生挽留,始同意担任通信导师。然而,1928 年毕业生的成绩陆续寄往天津家中,却因战事紧迫交通阻隔而未能回邮。推辞掉清华的教务之后,梁先生到天津租界静养,遗憾的是其病情并未因此好转,于 1929 年 1 月 29 日去世,享年 57 岁。

想时，就将其大致分为周秦、汉晋以还、宋以后三个时代，其着眼点是佛教文化的输入与中国本土文化的交争。又如，罗先生 1933 年撰写《〈战国策作于蒯通考〉补证》一文，其根据就是陈先生与刘盼遂发现的佐证。

1928 年 7 月，清华国学院最后一届招考新生，仅录取三人，即裴占荣、徐景贤、王静如。9 月 12 日，最后一年的开学典礼后，研究院第四届学生开始迎来新学年。国学院教师及其授课内容如次：

教授：陈寅恪讲授梵文文法（每周二小时）、唯识二十论校读（每周一小时）；赵元任讲授方言学（第二学期）。

讲师：马衡讲授金石学（每周二小时）；林志钧讲授人生哲学（每周二小时）；李济讲授考古学（赴美回校后）。

在清华的最后一年，罗先生选定的专题研究是“管子年代考”和“阴阳家源流考”二题，后来提交的毕业论文题目则为《子史杂考》。

为了维持生计，罗先生在进入国学研究院学习一年后，于 1928 年考入燕京大学和哈佛合办的国学研究所，因为该所每月提供津贴若干，可减轻其生活压力。在燕京大学，罗先生所学为“中国哲学”，指导老师为冯友兰、黄子通先生，其《管子探源》稿就曾得二位先生指正。^① 所以，罗根泽先生的学术研究，受到了梁启超、陈寅恪、冯友兰和黄子通等四位先生的影响，尤其是他的诸子学研究就明显体现了其学术师承。燕大期间，罗根泽先生曾与郭绍虞有所交流，并萌发了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念头。后来，郭绍虞也曾帮助和提携罗先生，甚至还推荐他到清华大学中文系讲授一学期古代文学批评史。

^①《诸子考索》，第 428 页。

1929年6月,罗先生同时毕业于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。^①两年的北京求学生涯,罗先生十分用功和努力,撰写多篇有关诸子研究的论文,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础。同年秋,罗先生因学长刘盼遂介绍,应开封河南中山大学之聘,任国学教授,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课程,从而开始了“二度的重走到教读生活”的人生第三个时期。他在《乐府文学史·自序》中说:“十八年的秋天,我答应了河南中山大学之聘,讲授中国文学史及其他的功课。”又据《诸子考索》,他在河南中山大学还讲授“诸子概论”一课,曾在1930年3月讲授《管子》,并将《管子探源》印授学生。罗先生在河南中山大学一直执教到次年上半年,完成了《乐府文学史》。

从1930年春开始,罗先生又到河北保定,任教于河北大学。对于这段教学生涯,他在《中国文学批评史·自序》中说:“1927年秋,负笈清华

① 1929年6月7日,清华大学举行欢送毕业同学大会。当时的《清华周刊》报导说:“清华大学部,成立四年来,近年系第一班毕业。旧制之最后一班与国学研究院之最终一班亦均于近年毕业,故本届毕业之情景,有空前绝后之以为存乎其中。”大会主席致词,“大谈本届毕业空前绝后之意义。”教务长杨振声致词后,“学生代表李景清君致欢送词。傅举丰君、苏宗固君、徐景贤君,相继代表大学部、旧制部及国学研究院致答词。其中,以徐君之论调与态度最为惊人,宛似天安门前之演说云”。

国学研究院本届毕业生共有10人,如期毕业9人,其姓名和毕业论文是:

门启明 杨朱篇的思想和年代

侯 堦 魏石经古文疏证

张景圻 洙泗考信录评误

葛天民 商周器物图案汇释

颜虚心 编钟编磬二八十六枚在一虞解三乐说

罗根泽 子史杂考

蓝文征 逸周书谥法篇疏证

(以上其人为上届毕业留校继续研究者)

徐景贤 考经余论

裴占荣 诗经疑义订解 虞翻年谱

此外,王静如补齐成绩后,亦给予毕业,但其论文未公布。(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,第82期,1929年7月6日,第4页)

6月21日,清华大学举行毕业典礼,校长罗家伦致词孤立,云:“研究院的同学,这也算是最后的一班,清华的研究院,在中国是开风气之先,虽然组织方面,未尽适合,但是这一点研究空气,是极可贵的。诸位毕业后,要本在校研究的精神,去继续努力,以求贯彻来校进研究院的初衷。”(《国立清华大学校刊》,第82期,1929年7月6日,第1页)

大学研究院。越明年，至开封，任河南大学教授。又明年，移保定河北大学。”暑假，罗先生回到北京，见到顾颉刚先生，商议编写《古史辨》。8月，居住于北平南城未英胡同一号，继续修改《乐府文学史》。9月，开始任教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，并草拟《乐府文学史自序》。学期结束，罗先生回到北平，执教于北平中国大学。在1932年至1933年初，罗先生居处北平，与顾颉刚合作，编成《诸子丛考》，作为《古史辨》第四册出版发行，影响较大。1933年春季，罗先生在清华大学代郭绍虞先生讲授一学期中国文学批评史，并从6月开始构思写作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。他作于1943年的《中国文学批评史·自序》说：“日月遄迈，呆拙濡滞，肇造迄今，忽将十稔。始以讲授清华大学，策蹇疾书，草成一至三篇；秋间增删复讲，翌年笔削付印。”直到1934年秋，罗先生一直居处北平，平生许多重要的学术成果都在此时完成。

从1934年秋至1935年夏，罗先生赴安庆，执教于安徽大学。《中国文学批评史·自序》说：“惟一九三四年秋至一九三五年夏，赴安庆，任教安徽大学。”在安徽大学，他开设的课程，有中国文学批评史。1935年秋回到北平后，罗先生执教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。此时，继续和顾颉刚合作，着手编纂《诸子续考》，即后来的《古史辨》第六册。历时一年有余，该书在“七·七事变”前已经印刷完成，只是惜乎因日军全面侵华，后由顾颉刚到昆明再公开发行。据《诸子考索》云：“这篇文章本来是《古史辨》第六册《诸子续考》的序文，全书在一九三七年印讫，因抗日军兴，延到一九四〇年才出版。”^①

在北方教书的八九年时间，是罗先生的学术黄金期，既有大量单篇论文刊行，撰写了几部重要诸子学专著，又编著完成两本重要论文集，还

① 《诸子考索》，第279页。罗先生参与编辑《古史辨》的过程大致是：从1930年夏开始，罗根泽先生与顾颉刚先生多次见面，遂开始编写《诸子丛考》工作。到1932年末编成后，交顾颉刚先生视查，遂被列为《古史辨》第四册出版。第四册出版后，罗根泽先生遂着手编辑《诸子续考》，并作为《古史辨》第六册在七七事变前已编辑完成并印刷出来，但是因为日本全面发动侵华战争，遂等到1940年方才又公开出版发行。

编写中学国文教材,为后来研究中国文学和文学批评史奠定了坚实基础。不惟如此,罗先生还与当时著名的学人有密切的学术往来,彼此问学。其中,罗根泽先生与国学院学人如刘盼遂、门启明等交往甚密,经常商讨先秦诸子学术,同邀拜访顾颉刚等。其中,刘盼遂先生曾推荐他到河南大学工作,又曾举荐他到北京高校任教。

罗先生与古史辨派的关系,毋庸置疑,对其学术生涯影响甚巨。1926年6月,顾颉刚主办的《古史辨》第一册编辑出版,宣告现代疑古思潮和“古史辨派”的形成。此后,以顾颉刚为核心集结的一批学者,疑古与考信相结合,考辨古史,尤其是六朝以前的历史。^①《古史辨》一共出版了七册,集结了大批著名学者的论著,其中包括梁启超、钱玄同、胡适、钱穆、容肇祖等,对中国现当代历史学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为廓清我国古代史的诸多问题进行了有益尝试。其部分成果虽然因为时代原因,可能有错误之处而需要重新考证,或者已经被证明错谬,但是却通过引发广泛讨论而推动了我国古代史研究的进程。比较有趣的是,除罗先生外,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学人与“古史辨”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,他们中许多人都曾有论著收入《古史辨》。^②

1937年7月7日,卢沟桥事变爆发,日军全面侵华。北平高校及学界多有外迁,罗先生挈妇将雏,跟随当时供职的北平师范大学,辗转迁徙至后方,“事变后,浮海南来,道出徐、济,南至京师,北返开封,然后西走

① 张京华:《古史辨辨名》(《云梦学刊》,2006年第一期,页17)认为,顾颉刚《古史辨》之“辨”包含两方面含义:一是辨伪,一是讨论。确乎如此,顾颉刚的古史“辨”,注重对于史料的重新考辨与古史的重新叙述,因此他编辑出版《辨伪丛刊》,也组织史学学会的活动。

② 如:第一册:王国维,《古史新证》第一二章。第二册:马衡,中国之铜器时代;余永梁,《柴誓》的时代考;杨筠如,姜姓的民族和姜太公的故事;姚名达,史记田敬仲世家中间邹忌的三段话;程憬,问孔子学说何以适应于秦汉以来的社会书之答书。第三册:马衡,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;余永梁,易卦爻辞的时代及其作者。第四册:梁启超,汉志诸子略存佚真伪表、荀卿及荀子、墨子年代考、续墨经余记、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;高亨,老子正诂前记、杨朱学派、韩非子初见秦篇作于韩非考;门启明,杨朱篇和杨子比较研究;刘盼遂,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。第五册:梁启超,阴阳五行说之来历;刘节,洪范疏证、论今古学书。第六册:杨筠如,关于荀子本书的考证;高亨,史记老子传笺证。第七册:吴其昌,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三续考。

长安，又随西北联合大学，播迁汉上”。年末，罗先生随师大同仁，辗转至西安，任教于当时由北平师范大学、北洋大学与北平大学合并而成的西安临时大学。罗先生回忆说，“开学未久，又迁到汉中，迁到城固，改名西北联合大学”。1939年，西北师范学院从西北联合大学分出独立设置，罗先生因而任教于西北师范学院。在1940年1月编印的《国立西北师范学院教职员录》中，我们可以看到罗先生时任国文系教授、国文系二年级导师。

由于日寇经常骚扰威胁，经济条件恶劣，陕西的办学条件较为艰苦，学校可供借阅的图书无多，罗先生遂萌生到条件稍好一点的重庆去工作的想法。从1940年1月开始，罗先生由陕入川，最终任教于内迁至重庆柏溪的中央大学，“闻中央大学自京移渝，载书颇富，遂于一九四〇年一月，由陕入川，重理丛残，际千载复兴之运，述先哲不朽之言，曾曾小子，诚不胜欢忭鼓舞矣”。

在重庆，罗先生最初执教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的国文系。后来，中央大学调整院系设置，教育学院与其他院系合并，罗先生遂进入中文系工作。据朱东润回忆，罗先生在中央大学开设的课程中有中国文学批评一门。郑文也在《金城续稿》中回忆说，罗先生在此期间主讲中国文学史及诸子选读等程。中央大学的工作，对于他继续完成前期准备开展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写作，提供了契机和条件。

罗先生在中央大学的工作较为稳定，生活得到改善，学术研究也开始步入正轨，遂集中精力重点展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的研究，从1940年开始就不断推出相关的研究成果。1943年初，《周秦两汉文学批评史》、《魏晋六朝文学批评史》、《隋唐文学批评史》、《晚唐五代文学批评史》等四册《中国文学批评史》，作为“中央大学文学丛书”，由商务印书馆推出。这些著作，奠定了罗先生在中国文学批评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。

到达重庆后，罗先生和昔日故友重逢，尤其是得以继续与身在重庆的顾颉刚先生往来，并加入其主持的史学会、经世学社等学术团体且出任理事。除此之外，罗先生还与避难重庆的侯堦、蓝文徵等清华国学院